

邓小平对工农城乡关系战略重构的探索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主张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首先解决农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这是基于中国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要实现的目标的重大变化, 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城市先行发展、产业发展目标重于增收目标的突破演进。这是在国民经济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后, 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全局对工农城乡关系的战略重构, 形成的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方略, 既成为工业化新进程中巩固农业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础地位的保障, 又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和农业农村向现代化的演进, 对如何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二步战略相适应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时代之问作出了回答。

关键词: 邓小平; 工农城乡关系; 以农业为战略重点; 首先解决农村问题; 让农民富起来

中图分类号: F2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24)04-0028-08

DOI: 10.16207/j.cnki.1001-5957.2024.04.00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时, 面对的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要实现的目标、实现目标的体制机制, 与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生产力水平上, 经过 20 余年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 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在产业结构上, 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 1952 年的 50.9% 下降至 1978 年的 27.9%, 同期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 17.6% 提高到 44.1%^①, 工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远超过农业, 实现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三次产业以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结构转换。三是, 在面临的现实问题上, 中国为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 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和实行与之配套服务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以及相对应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工农产业链脱节导致城镇化滞缓, 城乡人口结构和工农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工农产业结构转换。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要解决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 不仅包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对经济总量增长需要的问题, 还包括要解决历史遗留的结构转换滞后问题。四是, 在要实现的目标上,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进而让中国经济能够自立自强为战略目标不同, 制定了以让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这些因素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础上对工农城乡关系进行新的构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时代的新情况和新要求出发, 开启了对固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破冰改革, 对工农城乡关系进行了战略重构, 主张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首先解决农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 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城市先行发展、产业发展目标重于增收目标的突破演进, 探索形成进入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方略。

收稿日期: 2024-05-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10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2021mgczd009)

作者简介: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① 《辉煌 70 年》编写组:《辉煌 70 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年, 第 367 页。

一、基于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主张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

中国共产党面对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有变化,但完成经济发展的时代任务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不变,并不断加以深化和丰富发展。邓小平为这一指导思想的丰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以工业为先导的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是根据国情及其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经济发展以工业为战略重点,还是以农业为战略重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选择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和以重工业为中心^①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调整为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阐述到20世纪末的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两步走的经济发展目标时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②这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③确定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是在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历史条件下,对长期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调整,内涵丰富和意义重大。

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强调了工业要服务农业和发挥带动农业作用的发展方向。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阐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指出:“恢复农业的另一方面的政策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④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指出,工业发展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阐述实施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和措施必要性时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使农业得到先进的技术装备,使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如果离开这种支持,单纯依靠农民本身的物质力量和积极性,农业还是不可能高速发展,尤其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国家的支持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国家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农民的积极性也就会越来越高涨。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将工业向农业提供生产资料支持和促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工业的重大任务,强调了在工业体系建设中要注重农业机械、化肥等农用工业发展的问题。

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强调了加快农业发展以增强农业为工业、城市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的取向。邓小平对于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是不断深化,并通过战略布局予以保障。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夺取战争胜利的实践,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强调粮食的重要性,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实现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战略目标出发,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作报告时强调:“中国是一个有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又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不发展农业,不但影响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影响工农联盟和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不可能迅速地发展工业。”^⑧1962年7月7

①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9页。

⑧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

日,邓小平在总结动员大量农业劳动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挫伤农民发展生产积极性等导致农产品大幅度减产,进而不能支撑整个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这一困境的教训后强调:“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①邓小平在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国家建设的后腿。^②这一时期中国集中力量办好工业化这一战略性大事,注重发展农业机械、电力、化肥、农药、科技等现代生产要素,并将其在农业广泛应用,工业、农业都实现了发展,但也存在发展上工业快和农业相对慢的工农发展失衡问题,1953年和1978年,工业、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48%和2.07%,两者比值为5.55:1^③,高于国际上工业化初中期的2.5~3.1:1。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针对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发展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农业作为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经过一年试行后,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经修改后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农业发展速度不加快,工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就上不去,四个现代化就化不了。我国农业问题的这种严重性、紧迫性,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充分注意。”^④邓小平于1982年5月6日阐述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时,强调要重视发展农业。邓小平指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⑤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二〇〇〇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⑥改革开放初期,一系列搞活政策的实行,把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充分释放出来,实现了粮食等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改变了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状况,为1984年起中共中央把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及促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

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强调了要始终把农业抓得很紧,增强了经济越发展越要加强农业的定力。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指出:“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⑦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把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明确为“伟大的历史使命”^⑧。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在市场机制下流向较高回报的非农产业部门。尽管国家在发展战略上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但受发展工业见效快的利益驱动,实践中对农业不够重视,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不到位。针对实践中时有发生忽视农业的现象,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始终把农业抓得很紧。1986年8月10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针对粮食产量大幅下滑问题强调:“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⑨1990年3月3日,尽管在国民经济治理整顿中农业得到发展,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依然告诫:“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⑩邓小平强调在战略上要坚定经济越发展越要加强农业发展的定力和始终把农业抓得很紧,回答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小,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要不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

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强调了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目标导向及从政策、科技、投入方面加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0页。

③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7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23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86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9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强对农业的支持。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业发展受弱质性困扰,加之中国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对农产品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有了更高要求,这必然要求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经过1979—1984年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后,1985年大幅度下降,之后陷于低位徘徊。1986年12月9日,邓小平针对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强调:“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①1982年10月14日,围绕提高农业发展能力问题,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②,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注意对农业的投入。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农田基本建设要纳入规划。要搞个日程表出来,各方面都要注意有投资。”^③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粗略估计一下,到二〇〇〇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④1988年9月5日、12日,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强调,“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⑤。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的思路,回答了在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下如何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问题。

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保障工农协调发展的考察可见,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农业明确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从产业体系建设重点的把握上促进工农协调发展的新方略。中国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及实施与之对应的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政策,是改革开放初期农产品产量增长、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因素和宝贵经验。

二、基于“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的论断强调首先解决农村问题

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政策主张。1962年7月7日,邓小平阐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强调:“要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⑥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⑦这既是对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改革发展历程的客观描述,也是基于城市先行发展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为改变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状况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选择。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这一方略回答了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后如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如何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农村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明确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强化了对解决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后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的结构问题的保障。已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问题的研究,没有考察与国际上的区别。通过对长时段实践的考察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致力于促进工业、农业共同发展,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也大幅度提升。^⑧在取得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因为在受重工业资金密集而吸纳农业劳动力较少的约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向工业提供剩余能力弱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把公共资源集中用于城市发展,以及不得不实行把人口留在农村及城乡有别的二元政策,这导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乡差别明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5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⑧ 郑有贵:《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考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显。另一方面,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其中的农机、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实现快速发展,为农业农村提供了现代生产和生活资料^①,使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改善。换言之,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业化过程中“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②,以及资源向工业、城市转移而发生农村边缘化和农村凋落的问题,而是在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把大量人口留在农业农村、农业养育工业政策下农业农村没有实现更快发展的问题。换言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首先解决农村问题,是在已具备物质技术条件的基础上,为解决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中遗留下的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问题所作出的选择。

明确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强化了巩固农村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中基础地位的保障。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论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分析了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村问题的原因。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③这年10月6日,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④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再次强调:“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⑤可见,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经济发展要以农村发展为基础和社会稳定要以农村稳定为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遵循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规律之后,又认识和遵循农村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的规律,实现了农业农村基础地位的认识和把握由产业向社会范畴的拓展。

明确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强化了对根据农民占总人口八成的国情推进现代化的保障。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⑥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特点出发的论断,强调了要从农民占全国人口八成的国情出发,解决好现代化生产对劳动力需求少与农村劳动力较多的矛盾。在搞活政策下,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由于其以发展轻工业为主,又属于中小型企业,这两个方面的特性决定了其吸纳劳动力比重工业和大企业相对多一些,因而成为农民向非农产业拓展发展空间,构建新的城乡关系,并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迈进的可行路径。

明确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强化了对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好农村问题的保障。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改革就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⑦

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作出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以促进工农协调发展选择的考察可见,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和反复强调农村发展和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明确以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为方略,直接动因是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以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为方略推进改革发展,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繁荣,这又为城市改革发展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① 郑有贵:《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工农相互支援联动发展实现路径的探索》,《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7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5—256页。

三、基于工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农民贫困基础上的论断提出让农民富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进一步推进工农城乡发展和破解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工业城市发展的结构问题,需要在农民增收致富上实现破题。中国尽管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需要继续加快工业化进程。然而,在长期偏向重工业运行下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工业城市和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农民收入水平低,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农村为工业提供市场能力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的实践,为构建工农城乡关系并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启示。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①邓小平在其中作出的工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农民贫困基础上的论断,道出了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进一步推进工业发展要以农民富起来为前提。

让农民富起来是基于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国情的选择,强调了在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历史进程中要促进农民摆脱贫困和向富裕迈进。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通过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改善工农收入关系。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建立起新中国、建立起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此为坚实基础让中华民族稳稳立起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致力于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战略目标,既包括国家层次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农民层次的发展目标。在国家层面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其中第一二步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在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形成和实现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首先要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论述将农民摆脱贫困作为率先推进农村改革的动因时,也指明了让农民摆脱贫困在国家摆脱贫困中的方位。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②针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较大的问题,邓小平主张理顺价格,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就更少了。所以,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③这一论述表明,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这一国家新的发展战略目标,成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构建工农城乡关系的内在规定性。

让农民富起来是基于为工业提供更大市场的生动实践,强调了社会主义要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的实现。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工业化的功能,不仅表现在农业农村向工业提供资金和农产品,还表现在向工业提供更大的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业化在初期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如发生圈地运动、小农被大资本挤出,这些都使农民陷入困境,农业农村为工业提供市场的能力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在很长时期内工业化先发国家通过其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开拓国际市场,甚至实行殖民倾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将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作为战略目标,注重通过农村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大市场。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的产业发展规律,在实践中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农产品征购基数让农民休养生息、实行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鼓励农民亦工亦农(在就近的工厂上班和做农活兼顾,当时形象称之为“两栖农民”)、促进农村多种经营特别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等措施,大幅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业农村为工业提供市场的能力,形成了工农城乡相互促进态势。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方谈话对这一生动实践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①其中对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实践的肯定,实际上也作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镇与乡村相互促进的这一论断,也强调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要致力于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

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致力于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工农城乡共同发展的考察可见,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工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农民贫困基础上的论断,主张让农民富起来,有两个层次的因素:第一个层次的因素是让农民分享发展成果;另一个层次的因素是事关现代化全局层面的三个着眼点:一是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强调要通过农民增收致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大市场,着眼于农业农村发展对工业发展的市场拉动;二是从实现富起来这一国家新目标出发,强调要让农民富起来国家才能富起来,着眼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三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八成的国情推进现代化,着眼于统筹兼顾解决好现代化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少与农村劳动力多的矛盾。鉴于此,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增加农民收入提升为与农业农村发展同一个层次的政策目标,所实施的与之对应的政策措施促进了小康建设在农村的推进。

综上所述,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对工农城乡关系进行了重构,实现三个战略转变:面对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发展的结构问题,基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平,将长期坚持的以重工业为中心调整为经济发展以农业为战略重点,强化了从战略布局上对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保障,增强了经济越发展越要加强农业的战略定力,并强调通过政策、科技、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论断之后,面对城乡人口结构和工农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工农产业结构转换的问题,基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平,基于“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的论断,强调首先解决农村问题,实现由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向社会稳定发展以农村为基础的拓展,也实现由城市先行发展转向改革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从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目标出发,基于工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农民贫困基础上的论断,提出让农民富起来,进而把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到与产业发展同一层次的政策目标。^②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三农”问题的解决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工农城乡关系的论断和战略重构,明确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促进农业农村向现代化演进的路径,对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让中国在经济上稳稳立起来后,如何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二步战略相适应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时代之问作出了回答。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论断和战略重构,丰富和发展了马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6页。

^② 郑有贵:《目标与路径——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60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理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新时代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张慧娟 责任校对:张慧娟)

Deng Xiaoping's Exploration of Strateg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ZHENG You-gu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PC, with Comrade Deng Xiaoping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advocate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focus on agriculture, solve rural problems first, and make farmers rich. This is a significant change based on China's productivity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practical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strategic goals to be achieved. It is a breakthrough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vy industry as the center, urban development as the prior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oals over income growth goals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This is a new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which has been formed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from agriculture to industry as the main focus, with a focus on the overall strateg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step" strateg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t not only serves as a guarantee for consolidating the basic posi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but also promotes the cracking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owards modernization. It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first and second step strategie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agriculture as a strategic priority; addressing rural issues; making farmers rich

本刊编辑部地址变更启事

因山西师范大学搬迁到太原,本刊编辑部办公地点迁至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太榆路339号山西师范大学南校区行政南楼108室,通信地址变更为: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太榆路339号山西师范大学南校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邮编:030031,来往信函及交流期刊请按新的通信地址寄发。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